

章学新 编著 商务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理学



321
7-4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任 弼 时

章学新 编写

目 录

一、“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1
二、在龙潭虎穴里巍然坚持斗争·····	8
三、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日子里·····	17
四、从史无前例的长征到共产国际的讲坛·····	26
五、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37
六、为新中国诞生鞠躬尽瘁·····	46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这是任弼时逝世时，叶剑英写的一段悼念词，它深情而形象地概括了任弼时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风貌。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以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一起，是全党最爱戴的五位领袖。任弼时1920年投身革命，1950年因病早逝，30年如一日，鞠躬尽瘁，他的业绩凝聚在为中国的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一、“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任弼时是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现属汨罗市)人。父亲任思度，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乡村教师。任弼时从5岁开始，就住在父亲任教的学校里，在父亲亲切教导下接受启蒙教育。辛亥革命那年(1911)，他进入作民小学，后来，随父亲转到序贤小学。每当晨昏课余，父亲就给他讲岳母穆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唐家桥北面的汨罗江畔，是屈

原的故里，再往北就是长江边的岳阳楼。每年五月端阳，汨罗江畔的农民，包粽子、竞龙舟，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父亲就给他讲屈原的故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咏岳阳楼的名句，他从小就能背诵。

1915年，任弼时初小毕业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从此他离开父母，进入一个新的熔炉。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民主主义空气非常浓厚，正在这里求学的毛润芝（泽东）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开展各种活动。任弼时好唱歌，爱绘画，又会雕刻，他经常参加学生自治会举办的活动。高小毕业后，考入长郡中学，他的活动就更加广泛了，曾经担任过平民半日学校的音乐教员。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大动荡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但顽固的封建势力时刻在做复辟梦，而帝国主义则勾结封建军阀，加紧瓜分中国，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于是，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南北军阀混战，把苦难的中国搞得民不聊生，少年任弼时，怎能不感到痛心！这时期，他阅读中外历史，浏览名人传记。他赞扬过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俄国的彼得大帝，又为高举义旗维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爱国名将蔡锷的精神所感动。为振兴民族，他又曾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18年秋，列强分割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战败了德国。但是，“弱国无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不顾中国的利益，竟把德国在华的利益转给日本。10月末，任弼时参加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提灯会。

在热热闹闹的队伍散去后，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在作文中写道：“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只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因此，1919年北平爆发“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长沙学生的爱国游行和罢课活动。湖军军阀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学校即停止膳食，逼迫学生离校。任弼时便组织同学，回家乡去，散发传单，组织演讲，演出短剧，唤起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这以后，他阅读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0年暑假，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萧劲光没有回乡度假，他俩正在寻求毕业后的出路，经常到船山学社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的演讲会。听说上海的“外国语学社”正在招收学员，毕业后可以去俄国留学，任弼时对萧劲光说：“有办法了，我们到俄国去！”于是，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他们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任弼时便申请加入，成为第一批团员。半年以后，17岁的任弼时被派赴苏俄学习。起程之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人生愿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1921年5月，任弼时和萧劲光等10余人，从上海搭乘去海参崴的邮轮，离开祖国。5月的海参崴，还是一个冰雪世界，当时流行着鼠疫，街上冷冷清清。任弼时他们蜷缩在小旅馆的冷屋子里，等待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联络员接上关系。这

时任弼时感冒了，发着高烧，淌着清水鼻涕。海参崴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区，共产国际的联络人员叮嘱他们：从海参崴到伯力之间，是赤白交界区，日本人和白匪沿途盘查非常严密，只有到了伯力安全才有保障。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萧劲光化装成裁缝，三三俩俩，彼此装做不认识，暗中却相互照应着，小心翼翼地坐上从海参崴开出的列车。车到伊曼河，停了下来，旅客全部下车受日本占领军检查。

在检查站里，一量体温，任弼时被扣留下来，因为他发着高烧，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这一来，他和同伴们失散了。两天以后，当萧劲光等在伯力的约定地点焦急地等着他时，任弼时也到了。原来，他被扣留后，日本人一再盘问，他咬定是去苏俄谋生的理发匠，再一次量体温时，他急中生智，把体温表的水银柱夹放在腋窝以外，这样体温显得正常了，才通过检查站。过了伊曼河，他沿着铁路线徒步走到伯力和大家会合，大家喜出望外。伯力以西是红军的管辖区，但是，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沿线有的桥梁尚在修复中，燃烧木柴的列车，走一程停一停，直到6月初才到达莫斯科。

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原是苏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为了培养东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干部，共产国际决定改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斯大林。学员按国籍编班，中国班的人数最多，有30多人，以任弼时年龄最小，但他学习勤奋，俄语进步很快。管理全班生活的是年长一些的刘少奇，翻译是当时北京晨报驻莫斯科

的记者瞿秋白，后来他回国了，有的课程就由任弼时做翻译。

任弼时在东方大学的4年里，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西方革命运动史，职工运动理论等课程。除了课堂教学外，学员们还先后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的国际会议。刚到莫斯科时，他们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聆听了列宁的演讲。1922年1月，已经转为共产党员的任弼时，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这些国际性的会议，任弼时不仅从国内来的代表那里得知国内革命运动的进程，而且了解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形势、策略和斗争经验。与此同时，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性纪律性训练，使他逐步确立了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的决心和意志。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列宁离开了人间。天寒地冻的夜晚，任弼时和东方大学的代表们一起，列队进入莫斯科的工会圆柱大厦，站在鲜花簇拥的列宁的遗体旁守灵。在毕生难忘的5分钟里，他默诵着列宁的教导：“要理解革命工作的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相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好的”。

1924年秋，任弼时登上东行的列车，奔向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祖国。

任弼时回到上海后，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大学去任教。

上海大学有41名教师，20岁的任弼时是最年轻的一位。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所大学受孙中山资助，培养国民革命的建国人材，尽管它被人称为“弄堂大学”，但这里集中了一批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邵力子、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叶楚傖等当时著名的进步教师，所以又被人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任弼时在上海大学教俄语，在此期间，他为《中国青年》等刊物写了许多文章：《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要义》、《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还翻译了列宁的著作《中国的战争》。他日以继夜地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奋力写作，用邓中夏的话说，就是要把革命的理论“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地播种”，用这些“无声的炸弹”，“去摧毁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深沟高垒”。

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是有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按照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离开莫斯科前夕，任弼时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不同意在中国成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认为在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远东国家中，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4年历史，组织遍于17个省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发动团员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战斗队，而不是另建一个与党并列的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在筹备团的“三大”时，他

在《团刊》上撰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肯定了任弼时的意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中规定：青年团“政治上要绝对的受党的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在工作方式上，团应当青年群众化，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

1925年1月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了和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划清界线，会议决定改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举任弼时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任组织部主任。会后，任弼时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指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告诫全团“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在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中，任弼时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团的“三大”后，上海、青岛等地工人运动兴起，不久，五卅运动爆发。这时，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调离，总书记一职由任弼时代理，7月，他出任总书记。

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任弼时主持下的团中央发动青年学生和工人积极站在斗争的前列，全国55万参加罢工罢课的群众中，青年学生和工人约占一半。任弼时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 的责任》一文中写道：“现

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他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到人数最多的农民中去，进行“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深有远见地在团中央的通告中指出：“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

经过一年的努力，共青团在斗争中生气勃勃，组织遍于全国大多数省分，团员数量由“三大”时的2400人增加到9000多人，在尚无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党通过团组织指导群众的政治活动；团员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青年的比重由原来不到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为了充实党的基层组织，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将年满23岁的团员3000多人，输送给党组织；劳动童子团也系统地建立了起来。共青团已由“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浓厚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改变成为能领导广大青年参加实际斗争的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

二、在龙潭虎穴里巍然坚持斗争

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必然导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密谋以暴力“清党”，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已发展为投降主义

路线，他居然还称蒋介石为“应当尽力加以联合的革命力量”，称汪精卫是“实际存在的左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4月底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任弼时指出：陈独秀不依靠群众力量，不敢批评国民党，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坚决的政策，必将丧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但是，陈独秀置之不理。

“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团的“四大”。这时，在广州，著名的青年领袖萧楚女被国民党沉溺于珠江；在北京，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惨死于军阀张作霖的绞架；在上海，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被蒋介石摧残殆尽。在四周白色恐怖中，任弼时在团的“四大”的讲坛上凛然地说：“在这最严重的时刻，我们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的革命要求，规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已死同志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屠杀和干涉！”大会明确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号召团员和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着中国革命而踏

着烈士的血路前进！”但是，共青团的正确主张，却被陈独秀斥为“过火行动”，甚至下令要解散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团。

6月下旬，任弼时领导团中央两次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主张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陈独秀竟不屑一顾，予以撕毁。与此同时，他提出了11条右倾投降主义的《政纲》，处处限制工农行动。7月3日，任弼时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批评陈独秀的《政纲》“等于投降资产阶级”，再次提交《政治意见书》。陈独秀竟然说这是党的会议，共青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据理力争，陈独秀当众撕毁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实行武装“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此被葬送。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紧急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一起，严厉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积极主张发动土地革命。会议确立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新方针。在历史转变关头，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23岁。

八七会议后，全国工农奋起暴动。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各地的暴动中革命急性病和“左”倾冒险情绪发生，使暴动不断遭受挫折。9月，长沙暴动失败，党中央严厉批评湖南省委，限令再次举行暴动，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去长沙调查督促。任弼时和湖南省委一起，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他了解了湖南境内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检查了再次发动暴动的准备工作后，认为照此情况仓促行动，必遭受更大的失败。因此报告党中央，暂时停止长沙暴动。

盲动主义倾向在团内表现为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11月中，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出现取消主义倾向的原因是团组织转入地下后，部分同志发生恐慌，感到工作没有出路，消极地主张政治斗争由党来领导，团专心去做文化工作和儿童工作，或者认为取消团组织更能加强党的力量；而产生先锋主义倾向的原因是团的干部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认识片面，方法不当，错误地提出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来反对“机会主义的党”，行动上表现为军事冒险。他严肃地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先锋主义倾向，它的危害是把团变成“第二党”，在军事冒险行动中继续毁坏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起草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的通告。1928年1月，他在《无产青年》上发表《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进一步阐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暴动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反对那种“一切斗争皆成暴动”和“无动不暴”的错误倾向，强调党团员应深入群众，根据群众的切身要求，在实际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展革命的力量。在及时制止盲动主义倾向的斗争中，任弼时政治上是比较清醒的。

1928年1月，任弼时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4月，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六大”期间，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留在国内，代表党中央处理日常工作。这

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各地党的组织遭受敌人严重摧残后力量非常薄弱，而窃取全国政权后的蒋介石则得意忘形，一面推进“北伐”军事行动，一面镇压民众运动，加紧搜捕共产党人。4月15日，“六大”代表罗亦农刚从湖南到上海，即遭敌人杀害。但留守中央的同志却不畏艰险，每天上午在秘密机关碰头，讨论政治形势，草拟党的文件，接待各地来的同志。他们一面揭露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镇压民众运动、欺骗群众的反动面目，一面致力于整顿党的组织，转变工作策略和方法，踏踏实实地复兴革命。从4月末到9月初，任弼时代中央起草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军事工作大纲》、《对黄色工会的策略》等重要文件。任弼时虽然没有出席“六大”，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任弼时先后两次被捕入狱。

第一次是1928年10月，在安徽南陵县。当时安徽省党的工作较薄弱，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内部矛盾尖锐，工作陷入停顿。党中央派任弼时巡视安徽，传达“六大”精神，处理省委的问题。9月19日，他先到芜湖，处理省委的问题后，原来计划到皖南沿长江一带巡视工作，不料省委秘书处和团省委机关被破坏，形势突变，他决定先到南陵视察。

10月13日，任弼时剃掉了胡子，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扮作商人模样，在团省委书记陪同下，坐夜航船到南陵。第二天下午，出席城关地区党团骨干分子会议。由于叛徒告密，在会议还未开始时，被埋伏在香油寺古庙附近的国民党南陵

县自卫队逮捕。南陵县法院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时，任弼时神态自若，沉着应付。他化名胡少甫，身份是长沙伟纶纸庄的职员，到南陵来是催收帐款的。尽管敌人施用了酷刑：上夹棍，压杠子，任弼时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敌人除了从他身上搜走80元现金外，别的一无所获，只好把他作为“共党嫌疑分子”，押解到安庆的特种刑事法庭。

在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巧遇同乡彭佑亭。他趁敌人不备时，托彭佑亭捎口信给长沙恒丰纱厂工程师、他的堂叔任理卿，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他的爱人陈琮英。党中央得知后，立即派人陪同陈琮英从上海赶赴长沙布置营救。

长沙城里确有一家伟纶纸庄，是陈琮英的堂兄开的。陈琮英便以纸庄东家的身份出面，请任姓家族的远房姻亲、进步律师何维道出庭辩护。由于敌人没有掌握证据，又有伟纶纸庄出面证实胡少甫的身份，这样，任弼时在安庆饮马塘的看守所羁押了两个多月，被保释出狱。

任弼时第二次被捕是在1929年11月。那时，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这时党的城乡工作已有很大的复兴，“五卅”纪念日，“八一”国际反战日和“九一”国际青年日等，上海接连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国民党也加紧了疯狂地镇压，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遇难。11月17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的前一天，任弼时到华德路竞业里去参加团省委的扩大会议。竞业里是团省委新建立的秘密机关，但是却被公共租界的暗探侦察到了。任弼时推门进去，埋伏在里面的暗探立即将他逮捕，押到汇山路巡捕

房。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票，别的一无所获。在审讯时，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是从江西到上海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亲戚的地点被错捕了。这时，周恩来领导的军委特科设法营救。敌人当然不会轻信任弼时的口供，于是就上电刑。在电流的强刺激下，任弼时几次昏迷，但他知道，敌人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只要不改变口供，敌人是无可奈何的。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开庭时，党组织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租界当局由于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又没有确凿证据，生怕事态扩大，只好草草收场。在缴获的敌档里，至今保存着“彭德生”案的判决书和任弼时被迫留下的指纹卡，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拘捕“40天”。判决之后，任弼时被关入帝国主义的牢房——上海提篮桥监狱。

1929年12月25日，任弼时被“减刑释放”。他这一次被捕入狱，身子被摧残得更加厉害，以致在他的背上永远留下了两块被电流打击的深深烙印。

1930年5月初，从上海驶向汉口的长江轮逆流而上，船舱里坐着一位26岁的青年，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足登圆口布鞋，俨然是一位封建世家的年轻子弟模样，谁也不会料想到他是新上任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弼时。

4月中旬，出狱不久的任弼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中共中央代表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的中原大战行将爆发，国内直接革命形势已经来到，如

果全国10多万红军集中攻打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城市群众立即起来暴动，中国革命可以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且可以推动世界革命。任弼时不同意李立三的这些结论，他认为直接革命形势不等于说可以马上组织暴动，城市暴动必须首先发动群众，实现同盟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党的工作复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才达到的，而武汉的党组织，屡遭破坏，组织武装暴动，要经过更艰苦的过程。但李立三急于行动，批评任弼时是“阶段论”，是右倾。湖北省的党代会开了10天，任弼时和李立三的争论从大会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时，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去了，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坚持认为反动阶级已处于干柴烈火之中，只要大城市起来暴动，立即可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立即起程去武汉组织暴动。他只好服从。

任弼时到武汉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战火逼近京汉铁路的驻马店和漯河一带，蒋介石为了巩固后方，在武汉三镇对共产党的搜捕极为严密，港口码头，茶馆酒肆，到处是密探。晚上，长江交通断绝，甚至连文具店里出售油印机都要登记控制。任弼时先和贺诚夫妇主持的华中大药房——中央军委长江5省秘密联络机关接上关系，然后在汉口租界的闹市区，开设一家画像馆，以画师身份作掩护，领导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开展工作。这时武汉三镇的党员和团员，总共不到200人，其中有不少分布在几所学校里，工人中的党组织很薄弱，不要说马上组织暴动，就是发动日常经济斗争也很不